



全球化和贩毒集团

国际竞争导致的制造业岗位流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梅丽莎·戴尔



在《滚石》杂志一篇轰动性的采访中，演员兼电影制片人西恩·潘曾询问华金·古斯曼(Joaquín Guzmán) (绰号“矮子”)参与毒品交易的原因。这位美国政府眼中的全球头号毒梟回答说：“在我的家乡……没有工作机会。”在这一点上，已故诺贝尔奖得主、犯罪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先驱盖瑞·贝克(Gary Becker)可能和“矮子”的观点一致：经济机会对犯罪行为具有重大影响。

最近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笔者与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 Benjamin Feigenberg 和日本一桥大学的 Kensuke Teshima 合作的研究表明，墨西哥与中国在美国市场中的贸易竞争日益激烈，导致墨西哥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流失，这是近年来墨西哥毒品暴力事件激增的重要原因。

在过去的十年里，贩毒引起的冲突事件使墨西哥成为全球暴力中心，超过 10 万人在暴力事件中丧生(Beittel, 2017)。疲软的经济表现是否会

加剧城市暴力，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新近当选的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Obrador)主张将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减少毒品相关暴力的一个重要施政纲领。更广泛地说，当今世界的暴力事件大多集中在卷入可卡因贸易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Igarape Institute, 2017)。

国际贸易给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我们对墨西哥的研究显示，国际竞争导致的制造业岗位流失也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在国际层面的可持续经济一体化需要国际社会各方合作制定并执行创新方法，以应对伴随这种一体化带来的社会和分配方面的挑战。

失业与犯罪

关于发展中经济体城市地区就业机会与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诸多关于机会与犯罪之间关联的文献要么侧重于体制健全的工业化国家，要么侧重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农村暴乱。来自这两种背景的研究往往会产生相互矛盾的结果：针对富裕国家的研究通常未发现两者之间的关联(Draca and Machin, 2015)，而针对农村暴乱的研究发现经济机会与冲突和犯罪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Dube, García-Ponce and Thom, 2016)。

我们根据充分的理由预计，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在制度相对薄弱的较贫困经济体中，失业与

暴力犯罪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即便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发达的墨西哥等地也是如此。在低收入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往往非常薄弱。刑事司法机构通常缺乏资源，腐败难以避免。重要的是，犯罪组织可以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这增加了其自身吸引力，同时降低了失业者的求职成本。但同时，农村暴力（在许多基本方面不同于城市犯罪）的研究结果能否推断出这些情景，目前尚不清楚。

笔者在一篇新的论文中（Dell, Feigenberg and Teshima, 即将发表）与合作者通过研究国际贸易竞争导致城市制造业就业机会变化对墨西哥毒品贸易相关暴力的影响，填补了这一空白。墨中两国在美国市场的贸易竞争一直是墨西哥当地劳动力市场状况的重要推动力，引发了大量民众和政策决策者的关注。这种竞争似乎对当地就业机会产生了抑制作用，我们认为这种抑制作用与毒品走私和暴力早先发展的趋势无关。

我们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在 2007 年至 2010 年期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无显著增长，那么在我们的样本中墨西哥与毒品有关的凶杀案件的增长（2007 年约为 6000 起，2010 年超过 20000 起）应会下降 27% 左右。在国际竞争有可能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男性产生过度影响时，这种效果就更加明显，这与孩子群体参与非法行业的高倾向性相一致。

重要的是，这种影响集中于存在跨国贩毒团伙的城市。相比之下，在最初不存在已知毒品贸易活动的城市中，总体凶杀案及与毒品相关的凶杀案并未受到影响。这突出了犯罪组织在将劳动力市场状况与暴力犯罪相关联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激励的重要性

我们提供的证据表明，在墨西哥部分地区，年轻人正从合法就业转向参与犯罪活动，因为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使贩毒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从事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下降，使得团伙贩毒获利更大，而当地的劳动力会广泛从事这种非法活动，进而导致犯罪组织或其内部派系为争夺这些领土的控制权而斗争。的确，就业机会减少的城

市查获的可卡因也大量增加，在执法状况无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这可以作为可卡因贩运交易的合理指标。贩卖可卡因是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活动，其目的地绝大多数是美国，需要动员大量望风人员加入，他们是贩毒组织雇员中人数最多的群体。

这些发现凸显了盖瑞·贝克式方法的价值，他的方法采用一种包含经济动因的视角来看待暴力犯罪。我们的结果表明，对于因贸易竞争或技术变革而流离失所的工人，加强其社会安全网可以通过改善工人的外部选择来减少犯罪。

在未来几年内，由于经济一体化和技术变革而流离失所的工人很可能对体制薄弱的国家造成最严重的打击，传统体制结构之外的犯罪分子和其他行动者随时准备利用这种冲击为自己谋求福利。这些国家需要将国家和国际措施相结合，才能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各国应做出努力，确保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力和收入，包括为那些在更易受影响的部门就业的低技能青年提供教育和培训。

然而，在体制薄弱的国家，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可能缺乏独立缓解这些挑战的资源，因此需要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同国际毒品交易一样，其反响将超越国际边界。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和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缓解经济一体化的社会冲击，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来降低成本。FD

梅丽莎·戴尔（MELISSA DELL）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参考文献：

Beittel, June. 2017. "Mexico: Organized Crime and Drug Trafficking Organizations." CRS Report 7-5700,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DC.

Dell, Melissa, Benjamin Feigenberg, and Kensuke Teshima. Forthcoming. "The Violent Consequences of Trade-Induced Worker Displacement in Mexico."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Draca, Mirko, and Stephen Machin. 2015. "Crime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7:389-408.

Dube, Oeindrila, Omar Garcia-Ponce, and Kevin Thom. 2016. "From Maize to Haze: Agricultural Shocks and the Growth of the Mexican Drug Sector."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4 (5): 1181-224.

Igarapé Institute. 2017.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Cities, Daily Chart. Rio de Janeiro.